

■ 政治管理

#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 农民公民意识培育<sup>①</sup>

包先康<sup>1</sup>,朱士群<sup>2</sup>,赵平<sup>3</sup>

(1.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3.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农村既是整个社会建设的重点,也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农村社会管理和民生的改善,可以为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和谐积累正能量。十八大确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为农村社会管理提供了体制保证。然而,农民的公民性不足、农村社会发育不成熟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农民现代意识的培育,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性、促进农村社会的发育,从而形成真正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体制,最终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与一个强大的政府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农民;公民意识;培育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045-06

## On Cultivation of Peasants' Civil Awar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BAO Xian-kang<sup>1</sup>, ZHU Shi-qun<sup>2</sup> & ZHAO Ping<sup>3</sup>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2.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China;  
3.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area is the highligh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 can accumulate positive energy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or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established the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which has provided the systematic guarantee for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However, both the lack of peasants' civil awareness and the immaturity of rural civil society have become the main factors that restrict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erefore, we must improve the peasants' civi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peasants' civil awareness, so as to shape it into an innovative system of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led by the Party, spon-

① 收稿日期:2013-12-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6JZD0001);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11-12D122);安徽省软科学项目(1402052042)

作者简介:包先康(1964-),男,安徽舒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

sored by the government, coordinated with all the social sectors, and participated by the peasants, and mutually develop it into a vibrant society with a strong government hand in hand.

**Key words:**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peasant; civil awareness; cultivation

农村问题历来是中共我国政府关注的问题,其中农村社会管理作为农村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受到高度关注,特别是十八大确立了新的社会管理体制。作为对这一关注的回应,学术界高度关注农村社会管理及其创新问题。其中,关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管理模式创新<sup>[1]</sup>,二是农村社会治理结构创新<sup>[2]</sup>,三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sup>[3]</sup>,四是农村社会管理中政府管理创新<sup>[4]</sup>,五是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措施和路径<sup>[5]</sup>,六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研究<sup>[6]</sup>,七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体制研究<sup>[7]</sup>,等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体制机制等宏观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的确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但这些研究一个严重的不足在于忽视了对农村社会管理重要主体——农民的关注,忽视了农民现代意识的培育对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然而恰恰是农民的公民性不足、农村社会发育不成熟制约了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因此,需要通过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性、促进农村社会的发育,从而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 一 农民公民意识缺失对农村社会管理的影响

农民公民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其具体表现在:一是权责观的缺失;二是政治参与的工具性;三是集体合作的“善分不善合”的先天缺陷;四是法律意识的缺失<sup>[8]</sup>。即使一些农民存在一定的公民意识,也呈现“碎片化”状态<sup>[9]</sup>。缺乏公民意识的农民难以有理性行动,这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性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之一。同时,农民现代意识的缺乏,必然使得传统的“子民意识”占据上风,因此,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会采取“子民行动”,以寻求其利益的保护,从而使得农村社会的现代治理秩序发生扭曲,农村治理陷入困境<sup>[10]</sup>。而要摆脱上述困境,必须培养农民的现代意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sup>[11]</sup><sup>[31]</sup>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国民性”改造,在农村,就是将农民培养成具有“公民性”的新型农民,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要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sup>[10]</sup>。从社会管理来看,农民公民意识的缺失对农村社会管理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民公民意识的缺失,造成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主体的缺位。十八大确立的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确立了社会和民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了社会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和责任。在四大社会管理主体中,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已有可以依赖的管理体制和制度结构,而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则未有理想的制度结构来保证。因此,如何推进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进程,成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保证这种体制运行的有效性,社会和公众必须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这里就出现几个问题要解决:一是社会和公众有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管理;二是社会和公众愿不愿意参与社会管理;三是社会和公众有无能力参与社会管理。第一个问题取决于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管理的实践,现在来看,社会管理的体制赋予了社会与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和责任,但是社会管理实践中能不能保证社会和公众参与是另一回事。虽然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就确立了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但从这么多年的社会管理实践来看,社会和公众更多地被视为被管理的客体,他们的主体地位在政府独大的管理过程中被消解。第二个问题与公众的公民意识有无和成熟程度有关。公众的公民意识缺失或不成熟,直接影响着社会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现代社会是由现代人构成的,缺乏公民意识或者公民意识弱的公众,从“政治-社会”的视角来看,他们还不是合格的公民,缺乏合格公民的社会是难以建立的,即使出现了社会的雏形,这样的社会也难以承担其必要的社会管理的重任,不能很好地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对公众自身而言,公民意识的缺失或不成熟,将会直接降低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这样必然造成公众对社会管理事务的浅参与、被动参与或无参与。因此,公众公

民意识的缺失或不成熟,既降低了自身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又造成了社会发育不良,从而造成社会参与的不足。这些都为政府行政侵蚀社会提供了机会。第三个问题与公众的自身素质有关。这些素质包括“科技理性”层面的科技素质和“价值理性”层面的公众素质(主要指公民意识和公众能力)。我们现在的教育关注的焦点是公众的科技素质,而价值理性层面的公众现代素质教育关注不够,这必然造成公众公民意识的缺乏,公众能力不足。再加上公众实际参与机会的不足,公众的参与能力达不到充分的锻炼,公众的参与能力就难以达到实际的提高。总之,在社会和公众实际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不足、参与意识缺乏、参与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和公众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从而造成社会管理创新主体的严重残缺,而这皆直接或间接与公众公民意识的缺失或不成熟有关。在农村社会,农民现代意识的缺失或不成熟是不争的事实,它已成为农村社会成长的主要障碍,没有充分发育的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中社会协同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农民公民意识的缺失将会直接导致农民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么,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公共参与也就难以践行。农村社会管理缺少社会的协同、农民的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将会出现严重的主体缺位。

其二,农民公民意识的缺失,使得政府的管理行动难以获得农民的支持。无论是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还是新的社会管理体制,都强调政府负责,也就是说,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实际上把政府和社会、民众放在不对等的地位,这就可能造成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和责任被无限放大,而社会和民众的作用被矮化,从而导致社会和民众的“去责任化”。一个对社会公共事务没有责任的主体,让他们参与社会管理也就失去了说服力。这就要求我们对“政府负责”给出合理的解释。政府负责并不是说政府要承担无限责任,而是承担有限责任,社会和民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要对政府、社会和民众的责任做尽量可能的明确区分,使其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政府、社会和民众在社会管理中应该是平等的参与主体,共同提供社会管理服务。在农村的社会管理中,农民的主动参与决定着农村社会管理的效果。但是在农民公民意识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往往扮演的是看客的角色。当农村社会问题出现时,大多数情况下,深陷其中的农民“视政府为答案”,基层政府不能解决的要么自认吃亏,要么采取极端的暴力行动,要么就越级上访。有时某一个别事件也会激发农民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的爆发,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这时部分农民会由看客变成非理性行动的参与者,使政府的管理行动变得越发困难。同样,当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不足时,农民期望政府给予解决,他们认为,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提供是政府的事,自己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管这些“闲事”,“有空不如搓两把(打麻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公共品靠政府强制集资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方式闹得民怨沸腾,那时很多群体性事件与此有关;进入21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农村公共品的提供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的项目推动,作为农村社会主体的农民置身事外。这些情况的出现既与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方式有关,也与农民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参与意识等公民意识的缺失密切相关。缺乏主体意识的人,不可能主动配合政府的合理行动;缺乏责任意识的人,只能成为政府行动的看客;缺乏法律意识的人,就很难养成运用法律维护自己权利的习惯;缺乏参与意识的人,很难主动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社会管理行动要赢得农民的理解都很困难,更不要谈赢得农民的主动支持了。

其三,农民公民意识的缺失,降低了农村社会管理的效果。社会管理是多主体参与的过程,其中,社会与公众是最基本的参与主体,因此,农村社会管理需要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的广泛参与<sup>[12]</sup>。过去农村社会管理的最大弊端就是,农村社会管理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管理体制机制,广大的农民被排除在外,党委政府是管理的主体,农民是被管理的客体。其结果:一方面,党委政府要承担农村社会管理的全责,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一旦管理失效,党委政府就成了唯一指责的对象,农民降低了对政府的信任,怀疑政府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和权利被剥夺,在缺少参与机会和权利的情况下,农民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难以生成,助长了人们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就是说,农民公民意识的缺乏与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密切相关,反过来农民公民意识缺失,使得农村社会管理的效果大打折扣。农民公民意识的缺失,特别是农民理性参与意识的缺失,使农民的主动参与行

动难以形成,长期缺少参与实践的农民,参与能力必然有限。在农民参与意识缺乏、参与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即使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将农民视为平等的参与主体,农民也很难有效地参与到管理实践中,结果出现了“不给权利要权,给了权利又不行使权利”的状况,目前农村很多地区的村民自治就陷入了这种窘态。按照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村民被赋予了民主选举权、民主决策权、民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但村民自治实施以来,除非来自基层政府的强力推动,否则最起码的村委会选举也少有村民问津。就全国而言,每年农民的参选率也呈下降趋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民参与意识的缺失肯定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组织机制,当前村民自治所出现的微效或失效,就说明没有农民真正参与的社会管理是低效的,而缺乏公民意识的农民是不可能真正参与的。结果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农村社会问题频发,政府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农民越发成为被管理者或旁观者,农村社会问题如同放在水中的葫芦,一松手就会冒出来。

## 二 以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促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农民公民意识的缺失是造成农村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困境的根源之一。因此,加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通过提升农民公民意识来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其一,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主体的成长。从理论上来说,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是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但农村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内生主体是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因此,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需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的作用。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农民自发组织或在政府推动和支持下成立的,致力于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促进农村社会公共福利,实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具有自治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特征的民间组织。农村社会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农村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的重要主体,因此,要改善农村社会管理,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水平,必须大力培育农村社会组织。但是农村社会组织并不是农民的简单结合,而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即使是在政府推动和支持下成立的社会组织也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农民是否愿意组织或参与社会组织,与农民的现代意识有关。农民如果有强烈的公民意识,那么就会自愿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组织,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但就目前来看,农村社会组织还很发达,即使政府极力推动也难以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农民缺乏公民意识或公民意识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就显得很有必要。我们可以通过建制化的教育机制、组织机制和政策机制等来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也可以通过事件化的实践机制来强化农民公民意识培育。随着农民公民意识的提高,农民就会产生有利于合作的公民意识,农村社会组织就会慢慢地发育成长起来成为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的主体。同时,随着农民公民意识的提高,农民也会因关注自身的利益而关注公共利益,并自觉地参与到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之中,成为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的又一重要主体。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十八大提出的新的管理体制发挥作用。

其二,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可以激发农民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主动性。农民应该是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的主体,而不应该是被管理的客体,也不应该是旁观者角色。实践证明,当农村社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农民总是走向创新的前沿,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村民自治,都是农民的创新成果。但是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和实践中,行政权力似乎无处不在(政府管理的疏漏也无时不出现),农民始终被视为管理的对象,而被剥夺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其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人无法得到体现,严重挫伤了他们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果大多数农民被塑造成体制外的看客,以一种看客的心态看待、评价政府的管理行为,从而形成负面多于正面的政府形象。当一个群体始终被作为管理对象的时候,其结果:要么在重压和严控之下变成听话的羔羊,而缺乏主体意识、权利与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要么压制内心的不满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自身的利益被严重伤害时,以身家性命相拼,这往往会成为农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部分农民会以非理性的方式参与其中。显然,被管理者或看客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公民性”,没有“公民性”的农民是不可能参与到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中

去的。而农民“公民性”不足问题,只有通过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来解决,因为公民性主要是通过公民意识和公众行动来体现的,而公民意识是公众理性行动的前提。

其三,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具备创新能力。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主体是政府,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取决于政府的能力。从政府的创新实践来看,政府创新的目标主要是怎样管好人,而不是吸纳多元主体的力量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具有明显的工具性。这违背了政府管理的根本目标:为人民服务。在压力体制下,很多地方政府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视作目标,这是把手段视作目标,因为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其结果:“实践中的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创新,往往借助政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侵蚀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这些被冠之以创新的做法尽管在短期有助于解决农村社会的稳定问题,但侵蚀了农村社会自主能力的发展,长期而言,无论对有效的农村社会管理还是对政府而言,都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sup>[13]</sup>要改变这种局面,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主体必须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特别要调动农村社会和农民参与到创新中去。而要实现这种转变,提高农民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是关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的个人或群体,是不会有创新冲动和能力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行动能力,它只有在实际的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而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因而要提高农民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能力,其前提必须加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可以形成或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和参与意识,这些皆有助于提高农民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能力。主体意识本身就包含了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农民主体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有助于农民参与到创新实践中去,并通过创新实践提高其创新能力。农民权利义务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有助于农民把参与和改善农村社会管理视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农民参与意识的形成和提高,直接会对农民的参与行动发挥积极的影响,并在参与中不断提高其创新能力。

### 三 余 论

农村社会管理的改善需要多主体的参与,实践证明,单一主体(政府)的农村社会管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对于中国农村而言,由于农村社会自身发育的不成熟,农村社会管理基本的运行制度框架很多时候需要依赖强制性的外来制度建构。而对国家而言,其也偏好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介入社会机体,并且替代社会提供组织资源来管理社会。快速社会转型引发的问题,在社会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单一的市场无能为力,甚至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这让国家找到了新的使命,“地方国家权力再度出发了,以更为强劲的态势,对刚刚从国家的直接控制解放出来的社会空间,施以规制性的和强迫性的管理。”<sup>[14]</sup><sup>112</sup>很多研究表明,政府的合理介入对推进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譬如,政府的介入有效避免了村民自治可能出现的停摆,同时也激发了村干部的积极性、优化了村干部队伍结构和素质、减轻了农民负担等。有效的国家介入也为公民互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sup>[15]</sup>。然而,并非所有的政府介入都是有利于农村社会管理的,当政府过多介入到社会管理之中时,其过度的行政控制和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会对农村的社会管理产生消极的影响。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国家不合理的介入会破坏社区中的非正式社会关系而不提供替代的价值和功能,从而导致社区的衰败。正如福山所指出的,国家过多地介入社会内部会削弱人们进行自组织和协作的能力<sup>[16]</sup><sup>8</sup>。沃尔夫对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研究也发现,在这些社会中,“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削弱了市民社会和人际的互惠规范的重要性,“福利国家因此对于社会资本来说产生了一种排挤效应”<sup>[17]</sup><sup>142</sup>,从而削弱了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同时政府管理中也出现“管理漏洞”,这些漏洞当局者是难以发现的,这需要其他主体的帮助才能发现,也只有多主体的参与才能堵住这些漏洞。实际上,“在许多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中,官员和农民之间高度的互补作用是必需的。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不是努力消除政府的作用,而应是研究如何设计政府机构才更有效率,在更大的制度设计中弥补公民治理能力的不足。”<sup>[18]</sup><sup>13</sup>而一个具有良好公民治理能力的社会,又反过来可以提升政府的能力<sup>[19]</sup><sup>276</sup>。因此,政府在农村的社会管理,应当构建

一个有利于农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开放式管理结构,从而以政府的管理增进农村社会自身的发展。在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浪潮中,政府需要在政府与社会协作治理的理念基础上,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当前农村社会发育不成熟与农民现代意识的缺失密切相关,只有通过各种机制培育农民公民意识,才能提高农民的公民性,并促进农村社会的发育,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造就完备的创新主体,从而形成真正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体制,最终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与一个强大的政府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局面。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农民现代意识培育有其特殊性。其表现在:第一,农民公民意识发育的滞后性。早期现代意识在中国的孕育,首先来自精英阶层的自觉,然后在青年学生中启蒙,启蒙之风很少刮到农村社会,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现代意识才出现了“碎片化”呈现。第二,农民意识中传统的农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并存。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必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即积极传承农民意识中积极的因素,如,诚实守信、宽容、正直、善良、勤劳等美德,以丰富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内容;同时,要积极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注重对农民进行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和公德意识等的培养<sup>[20]</sup>。唯此,才能把农民培育成具有传统美德和公民意识的新型农民,从而有效地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新型农民的培养,包含多方面内容,公民意识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sup>[21]</sup>。

#### 参考文献:

- [1] 张新强.“三位一体”: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新探索[J].求是,2011(23):42-43.
- [2] 周春霞.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基于2005CGSS的实证分析[J].东南学术,2012(3):49-61.
- [3] 郭振宗.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及对策[J].理论学刊,2007(10):72-75.
- [4] 周建国.行政吸纳服务:农村社会管理新路径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2(6):10-14.
- [5] 匡和平.基于农村社会管理的政治社会化诉求[J].长白学刊,2012(3):20-24.
- [6] 杨丽,王名.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肃宁实践及其启示[J].探索,2012(4):142-145.
- [7] 狄金华,钟涨宝.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嬗变——基于整合视角的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3):147-152.
- [8] 陈南方.影响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障碍及其解决途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0(9):146-148.
- [9] 王胜国.农民的公民意识问题及其增强[J].理论探索,2010(1):98-99.
- [10] 包先康,朱士群.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一种社会政策的视角[J].学术界,2012(6):40-48.
- [11] 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2] 程昆.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公众参与[J].江西社会科学,2013(11):185-188.
- [13] 汪锦军.从行政侵蚀到吸纳增效: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162-168.
- [14] Davis D, Kraus R, Naughton B.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5] Heller P. Social Capital as a Product of Class Mobilization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dustrial Workers in Kerala, India[J]. World Development, 1996, 24(6):1055-1071.
- [16] Fukuyama.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M].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IMF Conference on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s, 1999.
- [17] Wolfe A. Whose Keeper? Social Science and Moral Obliga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18] Peter Evans. 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95.
- [19] Migdal J S, Kohli A, Shue V.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0] 何平立.公民观、公民意识与公众参与[J].探索与争鸣,2013(8):25-27.
- [21] 李菊英.新农村建设视阈下的新型农民及其培育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3):122-124.